

“内卷化”概念新理解^{*}

郭继强

提要:本文对“内卷化”概念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目前学术界流行诠释的新理解: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户)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它分别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相应地形成内卷化区间Ⅰ和内卷化区间Ⅱ。这既是对格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之本源的承继和挖掘,又能够整合黄宗智用内卷化概念所考察和揭示的问题,并把内卷化看作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的机制。如果说内卷化侧重于对某种经济过程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刻画,那么,刘易斯模型则偏重于对结果性现象的表述。将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联系,可以为经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去内卷化”拓展理论和实践空间。

关键词:内卷化 小农经济 内卷化区间

一、引言

“内卷化”这个概念,尽管因被格尔茨和黄宗智等学者用于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考察而在学术界名声大噪,并有从农业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张之势,诸如伸展到制度内卷化、国家内卷化、文化内卷化等,但是,它本身却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且悬而未决的重要争议:一是内卷化概念的内涵及其界定问题;二是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理上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黄宗智,2002;彭慕兰,2003;张家炎,2003)。

“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 *involution*, 它源于拉丁语 *involutum*, 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 由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或译为格尔兹, 吉尔茨、盖尔茨)成型, 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了争论。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① 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格尔茨则在

^{*} 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实现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研究”、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机制研究”的资助。

^① 韦森(2006)认为, 最早提出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内卷”问题的并不是格尔兹, 而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Geertz, 1963: 80—82)。然而,现有对格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的解读,却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1)黄宗智将内卷化理解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黄宗智,2000/1985:6);“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黄宗智,2002)。^①(2)刘世定和邱泽奇则认为:在戈登威泽和格尔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格尔茨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同时在把劳动的边际收益引入内卷化概念后,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刘世定、邱泽奇,2004)。彭慕兰(2003)也对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概念定义不当”,“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但正如刘世定等学者所说的,就内卷化概念而言,“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没有针对概念本身,未对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辨析,也未对由此建构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刘世定、邱泽奇,2004)。

在笔者看来,减少乃至消除概念的歧义性,是我们更好地接受并运用它解释和分析现实的前提条件。至于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理上是否有必要存在,是否意味着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能力与解释能力的开拓和发展,则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分析才能予以回答。

本文拟对内卷化概念的上述两大问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一种可能的理解,以求教于方家。笔者首先在挖掘格尔茨“农业内卷化”概念之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不同于黄宗智、刘世定和邱泽奇等学者的新解读,从理论上梳理内卷化的基本涵义,并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分别解析出相应的内卷化区间。其次,从本文提出的内卷化新理解的视角出发,整合黄宗智关于内卷化问题的论述,力求消解对内卷化概念理解的歧义性,强化其统一性。再次,将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联系,在凸显内

^① 内卷化“是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黄宗智,1992:自序:3)。

卷化之普遍性的同时,寻求“去内卷化”的基本途径。

二、对内卷化概念的重新解读及其模型考察

现有的关于“内卷化”概念的考察,大多可追溯到格尔茨 1963 年出版的《农业内卷化》一书,而格尔茨则在该书中回溯到戈登威泽对内卷化概念的发端。鉴于格尔茨对内卷化概念的奠基性作用,特别是不同学者关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异观点几乎都源自对格尔茨原文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格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论述的原文开始。

对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因缺少资本、缺乏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之中”的这一过程,格尔茨将其概括为“农业内卷化”。他写道:“爪哇人自己不可能转变成为资本经济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把已经普遍存在的集约化农业转变为外延性的农业。因为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剥离多余的劳动力,外加行政性的障碍,使他们不能跨越他们的边界(因为其余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树)。就这样,慢慢地、稳定地、无情地形成了 1920 年 Sawash 的劳动力填充型(labor-stuffed)的农业模式: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特别是在因甘蔗种植业而改善了灌溉条件、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的地区。1900 年以后,即使旱作农业有所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有非常小的提高。水稻种植,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Geertz, 1963:80)。^①

笔者认为,格尔茨用“农业内卷化”这个概念所描述的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农业部门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部门在外部扩张(包括农业的外延性扩展)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只能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

^① 刘世定和邱泽奇(2004)在《“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中有关于格尔茨对内卷化概念论述的译文,本文参照他们的译文,以便于本文与他们对于格尔茨的解读进行比较。

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概而言之,农业内卷化是对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的一种描述,是农业内部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却又不至于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这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分解为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其他投入要素量的情况下,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卷化区间。于此层面,我们探讨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农户)面对人口压力时做出的不同反应,即大农场按照利润最大化来增减劳动力,而家庭农场则不能。^①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进一步假定农产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农产品价格为 P 。记家庭农场(农户)的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分别为 MP 和 AP ,则边际产品价值(VMP)和平均产品价值(VAP)分别为: $VMP = P \cdot MP$, $VAP = P \cdot AP$,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1 来表示(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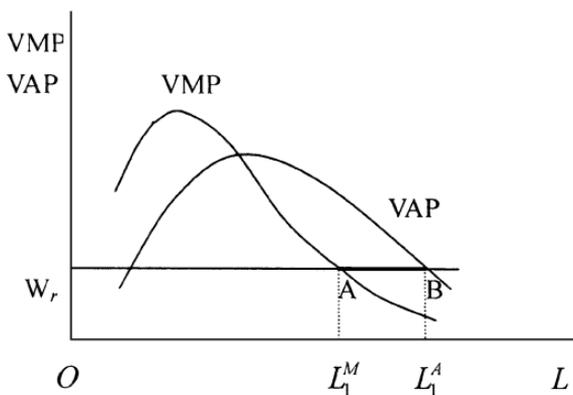


图 1 内卷化区间 i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跨界转移的条件下,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在市场上能够用生存工资(更准确地说是相当于生存工资水平的保留工资)雇佣到所需的劳动力。记生存工资(或保留工资)为 W_r ,倘若家庭农场(农户)像大农场那样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来雇佣劳动力,那么,最优的雇佣量由 $VMP = W_r$ 决定,均衡的劳动力使用量为 L_1^M 。

① 黄宗智曾指出,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做出的不同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动力。家庭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动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动力;面对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劳动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黄宗智,2000/1985:6、66)。

但实际上,由于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在生计的压力下,只能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进行劳动力集约化耕作。黄宗智曾指出:“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黄宗智,2000/1985:6)。从某一时点上说,黄宗智的分析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假如我们从较长时期来看,家庭虽然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但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反过来却又会通过营养和生育率等因素影响家庭人口的变动,而 W_r 则可以看作是再生产劳动力的最基本费用。^① 因此,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存在两个控制点,一个是 $VMP=0$ (亦即 $MP=0$, 边际报酬为零)所对应的劳动力投入量,记为 L_1^M 。如果劳动力投入量超过 L_1^M 点,则再增加劳动力投入时反而会减少总产出。另一个控制点则由 $VAP=W_r$ 给出,记相应的劳动力投入量为 L_1^A 。对家庭农场而言, VAP 也可以理解为人均收入水平。当劳动力投入量超过 L_1^A , 则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生存工资水平 W_r , 家庭将陷于困顿。至于在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过程,到底是先到达 L_1^M 点还是先到达 L_1^A 点,取决于生产函数的实际状况以及 W_r 的高低,但总的说来,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的理性选择是:

$$L_1 = \min\{L_1^M, L_1^A\}$$

简而言之,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农户家庭的生活水平调节着生育率及其劳动力数量,使得家庭劳动力数量长期趋向于 L_1 。较之于大农场雇佣 L_1^M 数量的劳动力,家庭农场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更多,即 $L_1 > L_1^M$ 。^② 所增加的数量($L_1 - L_1^M$),我们可以称为内卷化区间 i , 在图 1 中表现为 AB 区间(见图 1)。

赵冈力图将内卷化农业生产模型化视为一种可圈可点的尝试。他在《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提出了高度为平均维生费(average subsistence consumption)的水平线与边际产量曲线(更准确说应

① 人口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和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的探讨,可以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角度上考察。

② 这是因为 $L_1^M > L_1^M$, $L_1^A > L_1^M$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分析中,理性的生产者会选择在第二阶段进行生产,而 L_1^M 和 L_1 则都属于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指由 AP 最高点对应的劳动力投入量与 MP 为零点对应的劳动力投入量所形成的区间。

为 VMP 曲线——引者注)的交点,认为劳动力投入量超过此点就将进入内卷化(赵冈,1997)。^① 赵冈后来在《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一文中给黄宗智加上的“F点”,实际上也是指这一点(赵冈,2005)。他还认为,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边际产量减到零为止,就是内卷化生产阶段。在笔者看来,模型化无疑有助于我们明晰和深化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但是,就赵冈的分析而言:(1)黄宗智在分析中可能已经隐含了这一点。因为平均维生费相当于本文的 W_r ,从而,赵冈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本文图 1 中的“A点”,在该点上满足 $VMP = W_r$,它是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黄宗智要比较“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面对人口压力时所作出不同的反应”,势必会以这一点为参照系;而且,A点的获得早已成为经济学最基础的共同知识,不一定需要在专著中费太多的笔墨。(2)赵冈(1997)所提出的内卷化区间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原因在于赵冈仅仅指出了边际产量为零(即边际报酬为零)时的一个控制点或临界点 L_1^M ,而忽视了另一个控制点 L_1^A 。实际上, $L_1 = \min\{L_1^M, L_1^A\}$ 需要整合这两个控制点,以成为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数量的理性选择。

第二个层面则是在生产技术条件或其他投入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卷化区间。在技术进步或者其他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情况下, VMP 曲线和 VAP 曲线将右移,在图 2 中表现为从 VMP_1 曲线和 VAP_1 曲线右移成 VMP_2 曲线和 VAP_2 曲线(见图 2)。

我们记 $VMP_2 = 0$ 所对应的劳动力投入量为 L_2^M , $VAP_2 = W_r$ 所对应的劳动力投入量为 L_2^A ,从而,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的理性选择是:

$$L_2 = \min\{L_2^M, L_2^A\}$$

因此,在技术进步或者其他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情况下,家庭农场使用劳动力的增加数量为 $(L_2 - L_1)$,我们姑且称之为内卷化区间 ii,在图 2 中表现为 B_1B_2 区间(见图 2)。显然,从家庭农场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分析视角看,内卷化区间 ii 体现了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而从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徘徊在生存工资附近的角度考察,内卷化区间 ii 则又显示了家庭农场的自我锁定过程。

^① 原文中将内卷化表述为“过密化”,或“过密型”,本文为统一行文起见,直接写成“内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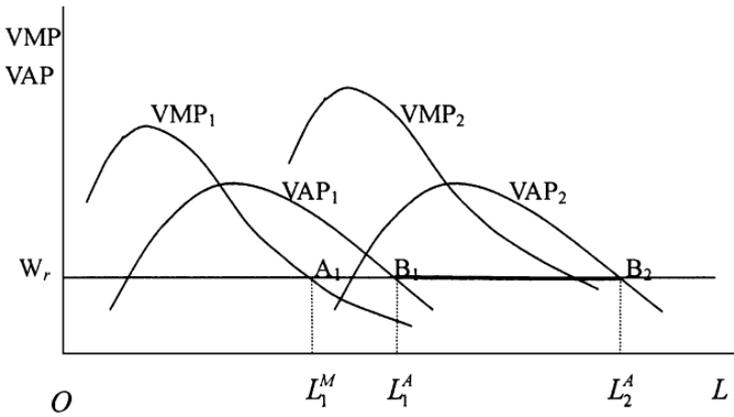


图2 内卷化区间 ii

刘世定和邱泽奇敏锐地抓住了格尔茨与黄宗智在考察内卷化时对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论述的差异性，^①并在引证和分析格尔茨的原文后提出，黄宗智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的理解是“有误的”：(1)“农业内卷化”是指在资本、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2)格尔茨从爪哇的水稻种植业中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引出“农业内卷化”概念时，重点强调的是在资本和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3)格尔茨的确说到了“边际生产率”，但他注意到的恰恰是其“稳定地维持”，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人均收入明显下降”，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趋势(刘世定、邱泽奇，2004)。

尽管刘和邱察觉到了格尔茨与黄宗智在内卷化概念论述上的差异性，但他们对格尔茨内卷化概念的解读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旨在刻画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精细化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战胜过程，我们可以从本文所引用的格尔茨的原文清楚地看到，就是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部门通过精细化耕作形成了1920年Sawash的劳动力填充型的农业模

① 格尔茨认为，“水稻种植，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Geertz, 1963:80)。黄宗智则将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理解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黄宗智, 2000/1985: 6)。

式,即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又不至于减少人均收入的过程。

第二,就格尔茨本身而言,他将“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与“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相等同,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原因在于,“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与“保持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两个难以兼得的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于图 2 来阐释。假定农业部门原先的生产状况可用 VMP_1 曲线和 VAP_1 曲线来表示,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耕种技术的改进,农业部门的生产状况变化成由 VMP_2 曲线和 VAP_2 曲线描述的状况。在内卷化区间 II 即图 2 中的 B_1B_2 区间,人均收入水平 VAP 保持不变,但在 L_1^A 上的 VMP_1 值与在 L_2^A 上 VMP_2 值通常是不相同的(见图 2),后者到底是高于前者还是低于前者都对内卷化过程影响不大,这就是说,“维持人均收入水平不变”并不需要“保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变”。事实上,在“维持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的同时又要求“保持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变”也是难以做到的。笔者认为,我们不宜刻板地拘泥于格尔茨“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应着重把握他所强调的“自我战胜的过程”。

第三,内卷化过程是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边际生产率递减)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因为 VMP 曲线穿过 VAP 曲线的最高点,^①从而,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增阶段, VMP 曲线上升, VAP 曲线也随之上升,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升,家庭农场(农户)的理性决策当然不会在此阶段停止劳动力的投入。其实,只要 $VMP > VAP$,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VAP 总是提升的。直到 VMP 曲线穿过 VAP 曲线的最高点后(此时 VMP 曲线已经处于递减阶段), VAP 才会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而且,即使是在 VAP 下降的过程中,只要劳动力投入不超过 $L_1 = \min\{L_1^M, L_1^A\}$,家庭的总收入总是提高的,同时还满足 $VAP > W_r$ (参见图 1)。同样的道理,在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的内卷化区间 II 中, L_1^A 处于 VMP_1 的递减阶段, L_2^A 处于 VMP_2 的递减阶段(参见图 2)。

有必要澄清的是,我们说内卷化过程是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阶段进行的,并非意味着整个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都是内卷化区间。黄

① 众所周知,在生产函数中, MP 曲线穿过 AP 曲线的最高点。当 MP 曲线和 AP 曲线同乘以一个固定值 P (产品价格)后,曲线的形状和相对位置并没有改变。

宗智以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来界定内卷化概念,就是把整个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都看作是内卷化区间,从而招致彭慕兰、刘世定和邱泽奇等的批评(彭慕兰,2003;刘世定、邱泽奇,2004)。笔者也认为,黄宗智的内卷化定义的确有些似是而非,尚未充分揭示内卷化的特质规定性,由此还造成内卷化区间的含糊性。在本文看来,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内卷化区间分别是在边际报酬递减阶段上的内卷化区间Ⅰ和内卷化区间Ⅱ。

三、内卷化概念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尽管黄宗智对内卷化概念的定义存在问题,但他原本要用内卷化概念论述的问题却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以本文对内卷化概念的新理解来诠释黄宗智的有关论述,或许可以在减少内卷化概念的歧义性的同时较好地整合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增长”等问题。

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写道:“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蔡雅诺夫指出,革命前俄国农业中曾存在过这种现象。克利福德·吉尔茨(即格尔茨——引者注)给爪哇水稻农业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本书将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对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黄宗智,2000/1985:6—7)。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黄宗智的原文,是想给读者忠

实于原述而阐释的认识前提。不难看出,黄宗智是要用内卷化概念来阐释家庭农场(小农经济)为什么会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假如我们撇开黄宗智对内卷化的定义而改用本文给出的内卷化界定来理解,那么,黄宗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就是本文提出的内卷化区间 i 。不言而喻,既然是家庭农场与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相比,那么,大农场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比较的参照系。

本文之所以要整合黄宗智对内卷化概念的论述,除了梳理内卷化概念的涵义外,更在于黄宗智对现实问题的洞见。正如黄先生自己强调的那样,他的研究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对内卷化边界的拓展。针对格尔茨把精细化耕作限于水稻生产,黄宗智以中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将内卷化的边界扩展到“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形式,而不是水稻的进一步密集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明清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型增长并未采取仅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形式。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不像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农业过密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样,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它们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达到高产台阶。自那时直至1950年以后开始引进新的投入,水稻产量极少或毫无增长。那里日益增长的对土地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那里所实行的是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黄宗智,2000/1990:13)。在该书中,为了凸显农业的外延性扩张之意,黄宗智甚至将“involution”译法从原来其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内卷”或“内卷化”,改为“过密化”。^①黄宗智还认为,今日中国乡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黄宗智,2006a)。可见,内卷化不一定局限在同一经济作物上,可以扩展到其他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甚至可以是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或者“半工”与“半耕”相结合,^②只

① 黄宗智实际上交替使用“内卷化”和“过密化”的译法。例如,他在2002年的论文(该译本经黄先生本人五次校阅)中使用的是“内卷”或“内卷化”,而在2006年的文章中则又用“过密化”,并将相应的农业称为“过密型农业”。本文为表述的一致性起见,统一使用“内卷化”的译法。

② 在黄宗智看来,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由于这个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与制度安排紧密相连,黄宗智又称之为“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黄宗智,2006a)。

要在维持生计水平上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就是一个内卷化的过程。

黄宗智第二个值得关注之点是,提出了分析的中心概念——“内卷化增长”或“内卷的经济”。黄宗智说:“我将论证,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而言,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确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以整个家庭的年收入来分析,农村经济也显示了若干程度的增长。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增长乃是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过密型增长’(即内卷型增长——引者注)”(黄宗智,2000/1990:77)。“单位工作日报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视为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 VAP (参见图 1)。显然,“内卷型增长”不是源自 VAP 的增加,而是来自于更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使家庭总收入得以增长,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在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变(在生存工资水平上)的情况下通过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增长。^① 如果笔者的这种理解能够成立,那么,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型增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格尔茨意义上的“自我战胜过程”,表现为本文所解析出的内卷化区间 ii (参见图 2)。

结合现实来看问题,黄宗智的“内卷型增长”揭示了在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小农经济得以存在的一种机理。“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黄宗智,2002)。客观地说,黄宗智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小农经济是富有教益的。以此而论,倘若黄宗智的有关论述能够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解内卷化概念的新视角下加以解读,并进一步解析出内卷化区间 i 和内卷化区间 ii,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明了地“把内卷化看作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理”。

^①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导论”中,在论及“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化增长不是在水稻生产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形式,而是日益转向棉花和桑蚕等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时已指出,“我将证明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得的”(黄宗智,2000/1990:13)。“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仅数糊口水平上的小农生产持续着,甚至随着商品化、农作密集化和家庭工业更为复杂”(黄宗智,2000/1990:12)。在某种程度上,内卷化增长,与伊懋可对晚清时期中国经济“量之增长和质之停滞”的论断(Elvin, 1973),可说是殊途同归。

本文理解的内卷化概念固然是建立在格尔茨对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黄宗智对中国长江三角洲农业和农村的考察之基础上的,但笔者相信,它很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用于对其他国家的小农经济问题的分析,并成为刘易斯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行为方式的一种基础。

刘易斯模型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说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的”。他强调,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假设应该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地区,但对埃及、印度、或牙买加等国的经济来说,劳动力无限供给显然是一个有用的假设。“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工资取决于维持基本生活的需求,而且,有时这可能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在大多数人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经济里,我们有一种更加客观的标准,因为可以得到的劳动力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根据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然而,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是由客观上农民的生产水平决定,还是由主观上传统的生活水平决定,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无论由什么机制决定,结果都是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Lewis, 1954)。然而,就本文而言,分析的主旨决定了本文关注的重点恰恰是被刘易斯认为“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刘易斯模型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城市工业部门的视角触及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工资水平),那么,内卷化则聚焦于农业内部,以厘清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何总是处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上。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家庭农场对劳动力的使用量为 $L_1 = \min\{L_1^M, L_1^A\}$, 相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到底是 L_1^M 对应的 VAP_1 还是 L_1^A 对应的 VAP_1 值,取决于家庭农场的生产状况,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人均收入水平大致上会在生存工资水平附近徘徊。换言之,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糊口经济。总之,内卷化至少可以作为“小农经济为何将农民的人均收入视作生存工资水平”的一种可能的运行机制,或者说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为刘易斯模型提供支撑。

本文将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联系,蕴含着可供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之处:(1)有助于表明内卷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般性。(2)即便农业内卷化,只要工业在发展并且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增加,社会

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发展的过程,既有增长也有发展。(3)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去内卷化”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思路。从内卷化和刘易斯模型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断,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去内卷化”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黄宗智具有良好的直觉并已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探讨。譬如,他针对中国的现状曾指出:“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黄宗智,2002)。^①

四、分析结论

本文针对“内卷化”概念提出不同于目前学术界流行诠释的新理解: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户)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内卷化的区间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进行考察:(1)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其他投入要素量的情况下,我们解析出了内卷化区间Ⅰ。黄宗智在比较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农户)面对人口压力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时,就是着重从这个层面所进行的分析。(2)在生产技术条件或其他投入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解析出了内卷化区间Ⅱ。在这一层面上,可以体现格尔茨意义上的内卷化原意,即把“农业内卷化”解读为是对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的一种描述,是农业内部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却又不至于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自我战胜”是战胜了增长的人口对维持生计所带来的压力;“自我锁定”则是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投入的决策锁定于 L_1 而不是由 $VAP = W_r$ 来确定。

^① 黄宗智2006年还撰文认为,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黄宗智,2006b)。

如果说彭慕兰、刘世定和邱泽奇等学者对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概念所提出的批评是着重于“破”的话,那么,本文对内卷化概念的新理解则着眼于“立”。本文对格尔茨和黄宗智有关内卷化论述的整合,更彰显了这样的判断:内卷化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制。而黄宗智则对这一判断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该判断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许多地区过去或现在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的认识,从而把内卷化看作是一种具有相当程度普适性的现象;另一方面,内卷化还可以作为“小农经济为何将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视作生存工资(更准确地说是保留工资)”的一种运行机制,成为刘易斯模型中所论及的传统农业部门行为方式的一种阐释基础。由此观之,内卷化概念具有工具性分析价值。

如果说内卷化侧重于对某种经济过程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描述,那么,刘易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重于对结果性现象的表述。将农业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相关联,有助于我们把内卷化和“去内卷化”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在农业外延性扩张甚至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情况下,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少于剩余劳动力存量,仍然存在内卷化倾向。不过,只要工业在发展并且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增加,社会经济总体上仍然是可以发展的。这意味着农业内卷化并不排除工业化和总体经济的发展。

内卷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细小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易陷入精细化耕作的路径依赖并被锁定。“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2005:121)。就现阶段国情而言,既有的农地制度安排、土地细碎化、城市偏向政策、城乡分割和歧视等因素都是不利于去内卷化的。摆脱农业内卷化亦即“去内卷化”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改变形成内卷化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于此,彭慕兰(2003/2000,2003)、黄宗智(2002,2004,2006b)、韦森(2006)的研究是我们借鉴的思想养料。^①此外,进一步探究人口增长的规律,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也是去内卷化的应有之义。

^①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把内卷化和刘易斯模型放在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郭继强,2006)的视角下,这种“去内卷化”实际上就是从组合 I 状态向劳动力供求的其他组合状态转变。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对此暂不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 陈勇勤,2006,《评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分析框架》,《天府新论》第5期。
- 郭继强,2005,《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2006,《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一个统一若干著名理论新视域的理解》,《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 黄宗智,2000/1985,《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等译校,北京:中华书局。
- ,2000/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黄宗智等译校,北京:中华书局。
- ,1992,《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2,《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第4期。
- ,2004,《再论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答彭慕兰之反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
- ,2006a,《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下),《读书》第2、3期。
- ,2006b,《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第10期。
- 刘世定、邱泽奇,2004,《“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彭慕兰,2003/2000,《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3,《世界经济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第4期。
- 恰亚诺夫,1996/196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韦森,2006,《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温铁军,2005,《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张家炎,2003,《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 赵冈,1997,《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 ,2005,《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
-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May).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宛丽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 It is argued that falsificationism is not only criticized in scientific philosophy, but also unsuitable for social science based on probabilistic casual rel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four problems when using falsification to justify the scientificness of social theories; 1. we should distinguish necessary condition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2. it's necessary to notice auxiliary hypothesis of theories; 3. statistical theories can't be falsified by a single counterexample; 4. the theory of scope limitation can't save falsificationism.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bo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by developing theories strictly instead of using the falsification carelessly, can we make the social theory progress continuously.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Endorsed by Adolescents: A focus group study ...
 Kou Yu, Fu Yan & Zhang Qingpeng 154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endorsed by younger adolescents with the method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141 subjects (69 male and 72 female) in 24 focus groups were asked to describe special prosocial acts of the prosocial people they knew. We listed 43 ite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the procedure of argumentation,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data, among which there were various behaviors that traditional researches had not addressed, which accounted for 56.32% of total, including relational behaviors, behaviors related to personal quality and behaviors of charity, etc.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ubjects' family SES among three types of schools, but not on the variable of Grade. Girls listed more relational acts than boys, while boys listed more overt acts than girl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in sexuality research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xt
 Pan Suiming & Huang Yingying 17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research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 with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in Chinese context.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s par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o be the main perspective in the field of sexuality study, and also examines its background, rationale,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space. Using examples in Chinese context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exuality stud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digen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ual issues and concerns,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studies critically and selectively, deconstruct over-medicalization and focus on the sexuality i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based on daily, bodily and diverse experien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 Guo Jiqiang 194

Abstrac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which differs from the prevailing opinion in academic circles. Involution, which is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entity, especially the family farms, to self-overcome and to self-lock in, is embodied in two different aspects, thus Involution Region i and Involution Region ii come into being. This paper follows and delves into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involution by Greetz, as well as integrates the relevant problems investigated and revealed by Philip C. C. Huang, and it treats involution as a probable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inner stabi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Compared with involution which lays particularly emphasis on economic process,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cess, Lewis Model lays stress on describing consequent phenomena. The combination of involution and Lewis Model will broade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pace of de-involution, which is to be achieved by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migr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BOOK REVIEW

Indirect Reciprocit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fter R. D. Alexander, *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 Du Yue 209

Techniques of the Power to Punish in Modern Society

Reading Cesare Beccaria,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nd Other Writings* Hu Shuijun 226